

乡村兽医去哪儿了？有证的多到城里看宠物去了

基层兽医工作体系不完善，从业人数不足质量不优地位不高，急需改善

本报记者梁军、任延昕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人类现存已知的传染病中有60%属于人畜共患疾病，至少有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

兽医是预防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前端。近两年非洲猪瘟的传播，暴露出我国动物防疫系统仍有薄弱环节，兽医工作体系还不完善，从业人数不足，质量不优，地位不高。

业内人士呼吁，我国要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必须坚持“人病兽防”，让兽医成为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预警人”。

上得了实验室也下得了牛棚里

隆冬，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家养殖场里，撒料机嗡嗡作响，奶牛吞嚼着草料。

39岁的乡村兽医沈俊康套上雨鞋，穿好防护服，在一旁等待奶牛吃完早餐。经过雾化消毒后，他和两名村级防疫员进入牛栏，开始抽样采血。

一头奶牛的采血过程通常需要三人配合，一人固定，一人采血，一人编号。等完成采血任务，牛棚里已尘土飞扬，一股混合着牛粪的药液气味掠过，冲入人的鼻孔。

“手速快，能最大限度降低奶牛的应激反应，同时保护我们的自身安全。”沈俊康说。他从业25年，经常被牛踢伤。

沈俊康将血样逐个标记、装箱，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有养殖户要卖家里的畜禽，需要办理产地检疫合格证，然后装车转运。“这可耽误不得。”他说，产地检疫合格证就是动物的“健康码”，也是各类畜禽在市场自由流通的前提条件。

十几公里外，榆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33岁的陈正博身披白大褂，正在对送检的动物血样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病理学分析。

跟沈俊康不同，陈正博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实验室，与同事负责全县重大动物疫病的日常检测和动态预警。这个实验室是在2009年建成的，检测能力覆盖全县，年检测量可达3万份。

牛羊得了什么病？该怎么治？疫苗起没起作用？这些养殖户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从他们实验室里找到答案。

像沈俊康和陈正博一样，基层兽医是能够诊治多种动物疫病的“多面手”。他们有的防护服从头穿到脚，使用先进仪器给牲畜采血、上报信息；有的坐在实验室电脑前，分析各类数据信息，指导养殖场科学饲养、及时防疫。

牛棚里穿防护服，实验室里穿白大褂。兽医们两种不同的“打开方式”，构成了基层动物疫病的防护屏障。

“鸟枪换炮”后不再“灰头土脸”

沈俊康的父亲年轻时就是夏官营镇的乡村兽医。那时候家家户户没有电话，也没有大规模



1月24日，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家养殖场里，乡村兽医正在给羊采血。 受访者供图

的养殖企业，各家各户就一两头牲口，一头牛生了病全家人跟着着急。一有求医的农户找上门，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去看病、打针。

在他儿时记忆里，父亲总是背着药箱行走在乡村猪舍间，深一脚浅一脚，猫着腰走进猪舍，与养殖户一起捉猪，给猪打防疫针。

“受制于当时的治疗技术和养殖水平，大部分时候，一名乡村兽医能做的很有限。”陈正博说。

多年前，陈正博的父母从事养殖业。父亲从定西市采购了一批仔猪，由于防疫检查没到位，买回来后发现了传染病。当时死了40头猪，经济损失达两万元。父母深受打击。

近年来，随着养殖业高速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甘肃不少农村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新时代乡村兽医们的工作环境大为改善，“鸟枪换炮”后不再“灰头土脸”。以前侧重打针看病，如今更加倾向于实验室检测，注重预防和保健，真正成为兽医行业的趋势。

新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伴随新型畜禽病毒出现，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等动物源性传染病不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而气候变化、生态环境退化以及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给动物疾病的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陈正博说，甘肃省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很重视县级实验室的能力建设。2020年全国非洲猪瘟防控政策要求，跨市省调运仔猪、种猪，当

地兽医部门需要出具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报告。这一年碰巧榆中县生猪出栏多，幸好县级实验室就可以做病原学检测，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到上级动物疫病控制中心检测。

“兽医的力量正在不断完善，养殖户的疫病预防意识增强了，也更加依赖我们了。”陈正博说，虽然工作过程艰苦乏味，但他依然热爱这个岗位，2019年他还被授予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

“干活的没证，有证的不干这个活”

“简单算一笔账，以2018年起流行的非洲猪瘟为例，通过前端防控和有效干预，如果将生猪的病死率降低1%，相当于救回600万头猪。”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党委书记孙研说。

“非洲猪瘟从非洲蔓延到欧洲用了50多年时间，从格鲁吉亚蔓延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然而传入中国后几个月内就影响了很多地区。这凸显了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的预警能力并不匹配蓬勃发展的畜牧业。”孙研说，基层兽医队伍建设还相对滞后，待遇两极化、资源不协调、功能弱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基层兽医体系和从业者。

事实上，各地村级防疫员正在面临青黄

不接的窘境。“大家都觉得这份工作又脏又累，还有受伤和感染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一年三四千元的补助，年轻人不愿意干，老的这一辈之后恐怕没人愿意接班。”陈正博说。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推行执业兽医制度”。2008年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也明确提出“国家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执业兽医制度确定下来，随后各地开始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甘肃执业兽医考试每年有1000人到1500人参加，由于需要专业知识门槛，通过率不足二成。”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何其健说，“尽管如此，许多通过考试的执业兽医并没有去基层一线工作，而是在城市宠物医院，为伴侣动物看病。”

考取了执业兽医从业资格的人，大多数是经过系统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但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会去基层，而一些基层真正的从业者往往并不持证。“干活的没证，有证的不干这个活。”孙研说。

此外，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属于全额供给，许多非专业人员挤占了包括畜牧兽医在内的农业技术公益性服务岗位，导致一些公益性技术服务也没有直接服务于农牧民。

记者在甘肃多地走访了解到，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被纳入乡政府管理后，乡村兽医由过去的单线管理，变为由动物卫生监督所、农牧局、乡政府等多头管理。

“兽医站没‘户口’，我们也就成了‘黑户’。”沈俊康说，基层兽医本就人手紧张，归乡镇政府管理后，日常琐事、杂事缠身，难以专注于业务工作，专业服务力量有些捉襟见肘。

“基层监督检疫至关重要，如果第一道关把得好，动物疫病就能控制好，出现大规模蔓延的风险就不大。但是一边做日常行政工作，一边兼顾兽医相关工作，容易造成监督和服务缺位。”孙研说。

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忧，孙研建议国家要加大对动物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从保障经济发展、保障养殖业发展、保障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估现状，适当增加动物防疫经费，合理配置人员和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兽医的社会地位。

同时，优化执业兽医管理制度，对学历和知识结构设定合理门槛，每年以继续教育的形式对执业兽医进行培训和考核；充分发挥基层防疫人员的力量，让他们有意愿、有机会考取资质。

打造“同一个健康”方阵

20世纪40年代，以盛彤笙、朱宣人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推动建立了我国现代兽医体系；改革开放至今，兽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我国的兽医制度也不断地接轨国际水平。

专家表示，新形势下，兽医的职能范围正在从过去单纯诊治动物疾病，发展到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多个方面。

孙研说，面对动物源性传染病带来的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已达共识，从动物源头进行控制，是最为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坚持“人病兽防”，也是保护人类免受危害的最佳途径。

“然而，我国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系统之间的合作关系仍然需要加强。”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面对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新发多发的形势，要尽快推动形成人类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的“同一个健康”方阵，在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上，充分发挥兽医的“预警人”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借此警醒世人，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人类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

何其健说，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涉及若干领域和众多职能部门，要建立起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监控网络和合作机制，由市场监管、海关、文旅、交通、商务、卫生、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参与。

“在现行制度下，最重要的是衔接人类卫生和动物卫生两个系统，整合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公共卫生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他说。

卖不掉放不了，商丘鹦鹉养殖陷“非法”困局

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已有30年历史。由于政策多次调整，特色养殖成为“非法产业”

省外部分地区森林公安部门，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由，多次抓捕经营费氏牡丹鹦鹉的销售商

业内人士呼吁尽快细化相关条款，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也能够有效地规范人工养殖市场

本报记者宋晓东、杨琳

养鹦鹉30年了，咋就“突然”犯法了？在河南商丘，数百户鹦鹉养殖户眼下愁眉不展，还有点担惊受怕。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已有30年历史的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鹦鹉产业，已经多次被外地公安部门认定为非法销售野生保护动物。40万只鹦鹉销售受限，相关人员被抓捕，众多养殖户资金链断裂，面临着“养不起”“卖不掉”“放不了”的困境。

大量鹦鹉积压、死亡

来到商丘市梁园区宁楼村，记者在村民王

翠兰家院外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三层高的房子，一楼住人，二三楼堆满了鸟笼，饲养着包括费氏牡丹鹦鹉在内的多个品种，但有的鸟笼已经空了。

王翠兰说，2019年刚投资20多万元扩建，没想到一年后就不让卖鸟了。现在家里的1000多对鹦鹉卖不出去，没有收入就买不起饲料，每天都有三四十只鸟被饿死。

在同村养殖户余福玲家，记者看到部分饲料袋已见底，给鸟做饭的蒸锅落满了灰尘。

“原来鸟喂得精细，每斤米拌上两三个鸡蛋放在锅里蒸熟，一天喂两三顿，现在都从地上扫点麸壳，一天吃不了一顿。”余福玲说，家里养了2000对鹦鹉，一个月光饲料费就要1.5万元，现在不让卖鸟，没有收入，鸟饿死几百只了。

已经养殖鹦鹉15年的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罗庄村村民张巍，同样遭遇“灭顶之灾”。以前家存栏最多时有2500对，现在只剩下1700对。从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一只鹦鹉都没卖出去，“为了养活这些鸟，我已经欠了快10万元的债了。”

商丘人工养殖费氏牡丹鹦鹉已有30年历史。商丘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作为全国最大的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繁育基地，商丘全市有鹦鹉养殖户837户，鹦鹉存栏量100万只以上，其中费氏牡丹鹦鹉约有40万只，养殖户近300户。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江西等地公安部门陆续查获多起买卖费氏牡丹鹦鹉案件，认定为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溯源到商丘，已经有养殖户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

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农户。为节省成本，养殖户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政策几经调整，“特色养殖”沦为“非法产业”

记者采访发现，商丘当地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鹦鹉大多是外来品种，在历史上曾被纳入相关部门批准的可商业性经营野生动物名单，但由于政策多次调整，这一特色养殖逐渐成为“非法产业”。

记者调查了解到，原国家林业局在2003年曾颁布的商业性开发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林护发〔2003〕121号）中，规定费氏牡丹鹦鹉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2003年以后，鹦鹉养殖在商丘快速发展，由于门槛不高，市场效益较好，养殖费氏牡丹鹦鹉成为商丘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创业致富的首选，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2012年10月23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公告废止了这一名单。2019年11月，费氏牡丹鹦鹉的保护等级由国家三级升为国家二级，无证买卖将触犯刑法。

部分养殖户反映，此前当地并未根据法律法规进行有效引导和管理。

“这些政策，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要知道犯法肯定不干。”余福玲说，“我们几百户也不是偷偷摸摸地养鹦鹉、卖鹦鹉，至少也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不能突然就说我们犯法了，我们冤得很。”

记者采访还发现，由于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繁育时间较长，各地对其司法鉴定的意见

不一，造成了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

商丘市森林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该局曾多次委托国家林草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当地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鹦鹉进行鉴定。由于繁育时间较长，产生很多杂交品种，出具的鉴定结果为“不确定具体种属”。作为刑事案件查办没有立案基础，因此商丘市森林公安没有查办过相关案件。但2019年年底以来，江西、浙江等地森林公安部门，根据国内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由，多次抓捕商丘市经营费氏牡丹鹦鹉的销售商。

此外，商丘绝大多数养殖户没有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不少养殖户说，不知道哪里可以办证，也没有相关部门曾对此进行督促、监管。

张巍表示，2012年他曾到商丘市政务服务办事部门咨询如何办理相关证照，但得到的回复是“不办理这类证件”。

养殖户夏玉华多年前向商丘市林业局咨询办证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回复，“大家都没办证，而且二三十年了也没人管，我以为就是不用办证的。”

厘清法律模糊地带，尽快妥善处置存量鹦鹉

法律人士表示，这已不是国内野生保护动物领域第一次出现社会争议。由于一些人工饲养物种是不是野生保护动物的司法认定较为模糊，导致执法层面不好操作，不利于基层司法实践。

河南最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四化说，人工养殖的动物和与真正的野生动物之间的保护不应当画等号。关于这一类问题，司法实践过程当中，过去的裁判尺度不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指导意见，但是关于人工饲养动物与野生保护动物之间，如何有效、准确地区分，没有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呼吁相关部门尽快细化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条款，准确地界定人工养殖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分标准，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也能够有效地规范人工养殖市场。

不少养殖户也呼吁应将买卖养殖鹦鹉和野生鹦鹉区别开来。余福玲说，同样都是养殖，猪、鸡、鸭、羊、牛可以卖，卖自己养的鸟就犯法，这个道理说不通。

“现在养的费氏牡丹鹦鹉确实是我们一代一代人工繁育的，国家可以鉴定，不能‘一刀切’地判定我们违法。”养殖户刘忠耀说。

针对目前大量费氏牡丹鹦鹉处置难的问题，养殖户急切盼望地方政府尽快出台政策，帮助解决。

夏玉华说，鹦鹉是活物，活一天就要吃一天，如果到春节还解决不了，我家1000多对鹦鹉就死光了。“就是不算钱的账，鸟再小也是命，眼睁睁看着饿死了，心疼啊。”王翠兰说。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已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商丘养殖费氏牡丹鹦鹉的实际情况，争取允许人工繁育种群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当地还拟协调一定补偿资金，对鹦鹉进行妥善安置，并对养殖户中受影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合理补偿，避免返贫。